

灶

亭子间：
一群文化人和
他们的事业

章 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名誉主编 唐振常

姚秉南 施宜园 周振鹤 主编

大 上 海

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
他们的事业

章 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特约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杨德鸿

大 上 海

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业
十里洋场：被出卖的上海滩
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
石库门：寻常人家
东方好莱坞：中国电影事业的崛起与发展

名誉主编 唐振常
姚秉楠 施宣圆 周振鹤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6 字数 332,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08-01244-x/K·294

全五册

定价 13.15元

目 录

- [1] 引言 上海文人与亭子间
- [6] 一 挤身亭子间：恐怖与理性的失败
- 北方作家的南迁
- 重返文化战线
- 文化事业的领航人
- [32] 二 走出亭子间：群体意识的复苏及最初的迷途
- 《新月》的态度
- 另一个战场
- 从《语丝》到《奔流》

[70] 三 救亡与独裁：政治暴力的严峻考验

重举“五四”的旗帜

“左联”的旗帜

文化“围剿”中的抗争

[116] 四 上海文化群：代际合作与歧见

迟到的大联合

兄弟阋于墙

历史造成的误会

引言 上海文人与事子间

30年代的上海文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堪称中国文化界最显赫的一支力量，而它的起因则要归之于1927年前后国内外的大批文化人向上海的汇聚。首先是一向作为“文化首府”的北京，由于北洋军阀对文化人的迫害，导致了大批文化人士的流失，那些曾经陶醉于办刊物和教书的知识分子在南迁的潮流中，纷纷卜居沪上。其次则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伴随着革命转入低潮，一批曾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第一线的文化工作者也就纷纷四散，有的来到沪滨，重理笔墨的旧业。与此同时，一些归国的留学日本、苏联、美国的文化人士，因为上海开埠以来在国内所占据的独特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

大 上 海

因而也寓居于此。于是上海再度成了混乱年代、恐怖年代文人寻找栖身之地的避风港。而这些困于生计的文人，初涉上海滩，往往都寄居于上海所特有的亭子间，由此也引出一群文化人和亭子间的一段段故事。

“亭子间”是上海弄堂房子中的一间。弄堂房子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都是上海居民最主要的居所。它又被称为石库门房子，从其结构看，是由四合院房屋蜕变而来。早期的石库门房子多“三上三下”，即正间带两厢。楼下正中的一间是客堂，东西两边是厢房，有前后厢房之分。客堂后为扶梯，后面有灶间。灶间上面的一间，即是上海人惯称的“亭子间”，其上还有晒台。后来这种石库门房子有缩为二上二下和一上一下的改变。20年代以后，又有外形参照西洋洋房的所谓新式弄堂的出现，但“亭子间”仍旧保留下来。

不用说，“亭子间”的居住条件是极差的，久而久之也成为房屋紧张的戏称，直至今天上海人形容住房困窘仍沿袭了这个称呼。因此，当一群正为生计所扰的文化人来到上海，寄居于“亭

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业

“亭子间”是不足为怪的。不过，将“亭子间”与上海文化人联系起来，最有影响的还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延安的一段讲演。那时，北平、上海两个文化中心因抗战爆发相继失去，原活跃于上海的文化人如丁玲、艾思奇、周扬、李初梨、张庚、崔嵬、江丰、吕骥、萧军、刘白羽等和曾经经历过长征的苏区文化工作者，如成仿吾、李一氓、李伯钊、洪水、危拱之、徐梦秋等汇聚到了延安。为了加强团结，消除各自的自大情绪，毛泽东曾这样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毛泽东委婉而又形象地指出了从上海来的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不大了解解放区的新天地，因而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大适合边区的格调、氛围；而生活于苏区的作家所写的作品艺术上又还欠完臻，意在要求双方各自看到和克服自身的思想和创作上的弱点。但“亭子间”与“山顶上”分别作为上海文化人和苏区文化人的代称，却不胫而走。

大 上 海

亭子间的居住条件是可想而知，文人寄居于此，也实属无可奈何。梁实秋就曾撰文《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感叹地说：“我住过有前廊后厦上支下摘的北方的四合房，我也住过江南的窄小湿霉才可容膝的土房，我也住过繁华世界的不见天日的监牢一般的洋房，但是我们这个‘上海特别市’的所谓‘一楼一底，房者，我自从瞻仰，以至下榻，再而至于卜居很久了的今天，我实在不敢说对它有什么好感。”又专门说到厨房之上，楼房之后的“亭子间”，表示住在里面，真可说是冬冷夏热。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到那一个墙角，都可以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升火，可以看见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中冉冉上升。而亭子间上面的所谓晒台，名义上是作为晾晒衣服之用，但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留声机的地方，堆杂物的地方，居于其下，其嘈杂可想而知。

但狭小的“亭子间”，文化人寄居于此，却也能迸发出激烈的思想火花。小小的亭子间，它可以是一份刊物的据点，也可以是文化人交流思想的乐土。杨之华在回忆鲁迅和瞿秋白分别

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

居住于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和东照里12号的情形时就说：“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象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太阳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亭子间里。”而文人居住在市民聚居的亭子间，创作的力量和素材也源源而来。如巴金，1925年8月下旬他在第二次到上海后，先住在康梯路的康益里，生活的许多情形都被写进《灭亡》里。他在《谈〈灭亡〉》中就说：“我住在上海康梯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

可见，许多文人虽身居于此，却未忘国家的兴亡。当30年代国民党专制主义的喧嚣和民族的危亡之音罩于沪上之时，这群栖身于亭子间的文化人勇敢地把避风港当作格斗场，发出要求民主捍卫独立的最强音，开始了他们的战斗。

一 挤身亭子间：恐怖与理性的失败

1927年春夏，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国民革命的热潮在瞬间消散，一些接受了新思潮的中国的文人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愤懑、窒息。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还充满自信，认为他们所潜心努力的启蒙宣传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为未来的中国奠定理性的基石，那么，面对1927年这个反理性的恐怖时代，许多人都 在毫无准备的白色恐怖笼罩的氛围中，失却了继续前行的方向。苦闷、悲凉、彷徨……这群文人感染上了从未有过的精神苦恼，一时四散，成了秋后的落叶。有的怅然地终老牖下，有的则怀

着满腔的悲愤，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英勇地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自然还有用同志的血邀功而飞上天，成了党国要人的。但绝大多数不死不生者，只能在歧路徘徊、苦闷；有的在非左即右的历史十字路口才于游荡，无所适从；有的则在万般无奈之中被迫暂避学海；也有的干脆流亡于海外。

“‘五四’的壮潮所产生的一些‘风云儿’也早已历尽了许多变幻！……形形色色，都在历史先生的跟前暴露了本相了。时代的轮子，毫无怜悯地碾毙了那些软脊骨的！只有脚力健者能够跟得上，然而大半还不是成了outcast（被遗弃者）。这是茅盾读了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后所发出的感慨。这部小说以1925年至1927年的政治风暴为背景，叙说了一位教师的心路历程。倪焕之是当时知识界的一名典型代表，他沐浴了“五四”的甘霖，也因此坚信启蒙的作用，坚信知识可以救国。然而，当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南京路目睹了“暴露了人类兽性，剥除了文明面具”的血案，他就开始反躬自问：教育家在社会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到1927年春夏，则更加

大 上 海

陷入绝望之中。“这几天的经历，他觉得太变幻了，太不可思议了。仿佛漫天张挂着一幅无形的宣言书，上面写着：‘人是比兽类更为兽性的东西！’”他所拥有的除了孤寂的悲痛之外，什么也没有，于是只能在恐怖的重压和个人的迷惘中吃力地爬行；只能渴望着——死，以了结自己不尽的迷惑。“唉，死吧！死吧！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同我一样的人，当然也没有一个中用！”

倪焕之感人的悲诉——“同我一样的人，当然也没有一个中用！”正是那个时期文人精神苦状的写照，而且这种感伤情绪也流露于那些曾经站在启蒙最前列的文人身上，象鲁迅、朱自清等人都深深地感受到“箭入大海”，“别无选择”的苦楚。

如果说鲁迅因为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目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因此，便看得怀疑起来，失望、颓唐得很，也促使他拿起批判的武器投身于“五四”的洪流。那么，面对白色恐怖的重压，却不得不承认任何无力的批判理性在恐怖面前都是无用的。他在给一位青年作家

的信中就坦率地表示：“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我的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的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我的话也并无效力，如箭之入大海。我觉得从此我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怖不见得是好东西吧。”

同许多文人一样，一向孤岸自洁，追求闲适静谧生活的朱自清也发现自己无所适从。1927年白色恐怖发生的时候，他远离漩涡的中心上海和广东，正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书。1928年春，他南下上海，得到一年前上海屠杀的第一手资料，这位在五卅惨案写下《血歌》的知识分子再也按捺不住了。但他既不愿与那些沉沦下去的五四时代的同仁同流合污，又不愿轻易地决定投向哪一方，于是不能不感到力图保留珍贵的感情与执着地追求学术真谛，与这个政治投机盛行、麻木的无情时代的格格不入。在《哪里走》一文中，朱自清就描绘了象他那样的文人陷

大 上 海

于绝望与困惑中心中难以解开的阴影：“大概是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危感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逼迫、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着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我是走着衰弱向灭亡的路，……舍此别无选择。”

然而，忘却并不是长久之计；“厌世”与“避世”的梦幻，也难以荡去心中的闷郁。正如鲁迅不可能“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说”，朱自清对革命纯真的热情终将被唤醒。经过白色恐怖和信仰危机之后，仍然有许多文人敢于在黑暗混乱中接过“五四”的火炬，继续奋力前行。而且，知识阶层开始对自己有了新的估价：倪焕之的道路是失败了，但正是意识到理性的脆弱，更发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能，他们又开始向更高的认识领域前进，也越来越抓住了知识分子将来如何扮演社会角色的关键；只有更加关注社会和政治运动，才能恢复对理性的信仰，真正地超越“五四”。

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业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群文化人汇聚于上海，重新开始了他们的事业。

北方作家的南迁

在这个混乱的年代，恐怖的年代，上海成为一处吸引文人的栖身之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要归之于上海自开埠以来在国内所占据的独特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它较北京距新政府的所在地南京更近；另一方面也比北京更易接触来往海外的人。也许更重要的，上海的外国租界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成为从事思想文化事业，具有独立思想的文人的避难所；同时，对于以教书办报为业的中国文人来说，上海对他们的吸引力也是经久不衰的。除了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在这里，即便上海没有一所大学可与北大、清华的名望相匹，却可以它很多名声甚好的私立学校而自豪，比如由那些出于爱国情感而从各教会学校退学的学生于1925年创办的光华大学，以及坐落于上海郊外的吴淞，在经历了早年的盛衰变迁后终于取得私立大学地位的中国公学。

大 上 海

在文人汇聚上海的潮流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北京文人的南迁。

北京文人的纷纷南迁，主要集中在1926年前后。那时节北京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种种经济的政治的实际原因，使文人大都站不住脚，于是纷纷南下。首先是政府积欠薪水，使文人的生活陷于困境。自1917年南北分裂以来，北京由于失去富庶的西南五省，税收已日蹙。而到1926年前后，长江以南各省纷纷独立，北京政府令不出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直、鲁、豫三省，财源更加枯竭，政府已成风前之烛，自存乏术，何况是学校经费？然而此时的文人大多就职于大学，只在业余写作，政府不给学校经费，发不出薪金，文人自然也难以为生了。正如梁实秋在《忆新月》文中所说：“这时节北方还在所谓‘军阀’的统治之下，北平的国立八校经常在闹索薪风潮，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也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梁实秋竟用了“逃荒”二字，足见其情形之严重。而当时在北京的国家主义派的第二号人